

外媒报道美国安局网络监控中国前领导人

我外交部要求美方就有关监听、窃密活动作出清楚解释

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4 日对有关美国国安局近年来对中方一些公司、政府部门进行监控和窃密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，并要求美方就此作出清楚的解释，停止这种行为。当天例行记者会上，有记者问，据外媒报道，美国国安局近年来对华为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窃密活动，目标还包括中国前领导人和外交、商务等部门以及银行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

洪磊说，中方对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媒体披露了很多美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施监听、监控、窃密情况。中方已多次就此向美方提出交涉。“我们要求美方就此作出清楚的解释，停止这种行为。”

据新华社

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,彩礼要3斤3两百元大钞

冀南农村男多女少的婚恋怪象

有 2000 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，22~26 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 30 人；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 2000 人，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 30 多人……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寥寥无几。

近日，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，邯郸曲周、鸡泽、广平、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，“找媳妇难”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，而由于“找媳妇难”引发的专业媒人“不择手段”谋利、女方对彩礼“狮子大张口”，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。

四五个小伙子，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

“19 岁时，对于相亲找对象，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——要找个自己喜欢的‘女神’。”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记者，1987 年出生的他“相亲史”始于 19 岁。

后来由于 20 岁外出打工，婚姻大事被暂时“搁下”。3 年前，24 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。此时李建国发现，与 7 年前已经不同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。

经过 3 年“几十次”相亲，27 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“女神”。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 5 岁孩子的妈妈了。“现在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——女的。”他强调，“只要女方不挑我，我肯定不挑女方。”

曲周县 25 岁的农村青年郭威，面对记者“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”的问题时，一脸嗔怪地反问：“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？”

这两年，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“不愁嫁”。“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，明天就有小伙子跟媒人登门提亲！”采访中，有多位邢台、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。

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，在邢台、邯郸一带农村已是“见怪不怪”。李建国告诉记者：“我和姑娘聊了会儿，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，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！”对于这样的相亲，李建国坦言：“感觉像是求职面试！”

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？有农民告诉记者，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，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。在他看来，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。

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，因为需要干农活，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，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，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。“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，这一拨净小子。你打听吧，哪个村都是！”

对于农村“找媳妇难”的成因，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：由于收入、房子等现实问题，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，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。

18 个媒人同说一门亲，“谢媒”就花了 1.8 万元

这两三年，随着冀南农村男青年找媳妇越来越难，专业媒人开始活跃。

每次被媒人带着相亲，郭威都会往兜里装上 2000 元。除了给见面的女方买点瓜子糖果，还要给媒人买烟、请媒人吃饭，给媒人 50 元到 100 元的“电话费”等。“甬管不成，相一次亲就要 1500 元左右。”郭威在邻近村当“焊工”，月收入不过 3000 多元。“相一次亲半个月收入就没了”。

馆陶县青年徐海宁调查发现，如今的相亲，多数并不是一个专业媒人在组织。一个媒人通常还会少则叫上三四个媒人，由这三个媒人带着相亲的男青年去和他们联系的女青年相亲。很多时候，一些媒人并没有联系相亲女青年，也会跟着“凑数”吃饭和领取手机话费钱物。“媒人之间，你这次叫上我，我下次就叫上你！”徐海宁一个朋友结婚时为了“谢媒”，每个媒人给 1000 元，一共给了 1.8 万元。“18 个专业媒人同说了这一门亲！”

对于类似的“规模”相亲，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已习以为常。他第一次这样规模的相亲是“前年腊月二十一”。当天一大早，3 个媒人就主动上门说要给他介绍对象。

媒人告诉李建国父母，南边村、北边村有好几个姑娘呢！李家刚刚询问“怎么去”，就有媒人拿出电话回答说：找个车吧！很快，一辆面包车就拉着李建国与 3 个媒人出发了。

“到了南边的村，先找这个村的媒人。”李建国给 4 个媒人一人一包 10 元的烟。谁知媒人嫌这烟太逊，问他要另一个牌子的更贵的烟，李建国只得又去换烟。给相亲的女方家买了水果和糖果后，一进女方家才得知：来得不巧，姑娘出去玩了，不在家！

“这时媒人跟我说：不要紧，北边村还有。”小面包车拉上几个人又直奔北边而去。到了村里，李建国又先给北边村的媒人买了一盒好烟。

这一天，不包括那个没见到的姑娘，李建国一共和 3 个姑娘相了亲。“车钱花了 230 元左右，请六七个媒人吃饭花了差不多 400 元，买烟花了 100 多元，加上给女方家买的水果和糖果，一天下来就是 1000 多元。”

三年相亲几十次，李建国发现不仅专业媒人以此谋利，甚至一些出租车、饭店、烟摊和媒人一样，挣的就是相亲的钱——每一拨媒人组织相亲，都会找固定的车；媒人收到好烟后，自己也不吸，而是再卖回烟摊；就连饭店的服务员看到小伙子请媒人来吃饭，也可着劲儿推荐价格较贵的“特色菜”。

钱没少花，相亲效果却差强人意。李建国一天见的那 3 个姑娘，一个也没成。他告诉记者：“媒人只顾挣钱，甚至连相亲的这两人是否般配都不关心！”



在《恐婚时代 2》中，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 3 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。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“新三金”彩礼的现实。（图为剧照）

彩礼要“新三金”，男方父母不能超过 50 岁

同为 80 后的崔博和徐海宁，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馆陶县，在工作之余，两人在县城成立了“茨花青年影视工作室”。

截至目前，他们拍摄的六部作品中，2013 年推出的《恐婚时代 1》和《恐婚时代 2》在互联网上最受欢迎。“《恐婚时代 1》的点击量达到 20 万，《恐婚时代 2》更是在 100 万左右。”崔博告诉记者，这两部反映农村男青年“娶不着媳妇”和“娶不起媳妇”的影视作品之所以引起关注就在于其“接地气”。

《恐婚时代 2》中，女方向男方提出索要“新三金”作彩礼。“‘新三金’可不是金项链、金戒指和金耳环。”徐海宁介绍说，“‘新三金’就是三斤 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。在剧中男方年迈的父母将 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，一张张用水浸湿，然后再用抹布擦干，为的就是过秤时，使人民币能更‘压分量’，而又不被女方发现。”这些情节都来自真实生活，而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有原型的”。有农民告诉记者，一般三斤重的百元面值人民币约有十万元。

由于“找媳妇难”，导致冀南农村娶媳妇越来越贵。记者采访时发现，借着结婚向男方索要钱物的花样可谓不断翻新：彩礼“万紫千红一点绿”——“万紫是一万张 5 元的，千红是一千张 100 元的，一点绿不是翡翠就是玉”；“一动不动”——“动的是小汽车，不动的是二层楼”；“万里挑一”——“订婚时男方就要给女方一万”……

不仅索要钱物，而且对房子、汽车，甚至男方父母年龄都提出苛刻的要求。“一团院、二层楼、彩礼就要三斤三两、家里四轮汽车两头尖、父母不能超过五十岁。”有当地农民将娶媳妇时女方提出的条件编成了“数字口诀”。

至于父母为什么不能超过五十岁，一位馆陶农村男青年解释说：“父母超过五十岁，需要照顾，将来还不能带孩子！”“多现实

啊！”坐在旁边的一名男青年愤愤不平地说。

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，婚恋观念却停留在 20 年前

对于时下专业媒人组织的程式化相亲，曲周农村青年张嘉概括为：“她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；她怎么问你，你就怎么问她！”而在他并不算短的“相亲史”上，不同于这样的相亲交友，只有过一次例外。

说起前年的那次恋爱经历，张嘉认为还颇有些戏剧性。“姑娘是一天晚上我用聊天软件的‘搜索附近人’的功能，搜索出来的。”姑娘所住村庄与张家相隔三里地。

相比相亲直奔主题的程式化问答，张嘉和姑娘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可谓“天马行空”。一聊十几天后，张嘉得知姑娘还“没婆家”，于是提出“见个面”。有了之前的充分了解，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。虽然最终因为彩礼等问题，两人没能走到最后，但张嘉坦言，这才是恋爱的感觉。

记者了解到，在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村青年中，有张嘉类似经历的并不多。虽然邢台、邯郸一带农村青年在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数，但绝大部分男女青年还是回乡谈婚论嫁。穿着时尚的他们在恋爱婚姻的途径、方式和 20 年前基本一样——由媒人带着相亲、订亲、结婚……

“即使是在外边谈了恋爱，一般父母的态度也是能拦住就拦住。”曲周李于子口村有村民告诉记者，当地农民还是觉得结婚对象是“本乡本土”、“知根知底”的更踏实。

去年，徐海宁曾试图为农村青年男女搭建交友恋爱的网络平台，改变当地农村青年几十年不变的婚恋方式，但却以失败告终，这个相亲交友平台一直人气低迷。“究其原因，不外乎由于害羞、不好意思，不愿参与。”他不禁感叹道，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为什么还依旧停留在 20 年前？

（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）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